

# 六十年来蜀文化研究的重大收获

宋治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摘要：蜀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文献记载中关于蜀的历史有较浓的传说色彩。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大量的出土资料揭开了古蜀的神秘面纱，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翔实可信的依据。本文回顾了六十年来四川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以及对蜀文化研究的重大收获。

关键词：蜀文化；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4-0023-05

蜀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关于古代蜀的历史以前我们所知甚少。仅有一些依据传说经后人整理的资料，这些材料少而零星，并且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这就给我们研究古代蜀的历史带来很多困难，李白的诗中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更加重了古代蜀的神秘感。而中国古代的历史是包括了蜀的历史在内的，研究中国古代史就不得不研究蜀的历史。老一辈学者利用这些有限的资料，对蜀史进行了探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特别是1949年之后，一些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蜀史的研究作了新的尝试，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

关于蜀的地域，曾有不同的意见，1959年在彭县（今彭州市）曾发现一处周代的青铜器窖藏，其中2件簋的铭文分别为“覃父癸”和“牧正父己”，徐中舒先生研究2件簋为殷器，铭文属殷的二个家族，认为是蜀王参加武王伐纣的战利品或周王颁赐之物，“这正是蜀人参加伐纣之役的最直接有利的物证”<sup>[1]</sup>。此殷器出土在成都附近，说明当时的蜀应在川西的成都平原上，这和以后的重大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1931年（一说1929年），在广汉的太平场（今南兴镇）的燕家院子旁，偶然出土一坑玉石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

馆进行了考古发掘。在郭沫若给参加发掘者林名钧先生的信中指出：“你们在广汉发掘的工艺品，如方玉、玉璧、玉刀等，一般与华北、中原地区的出土器物极相似。这就证明，西蜀（四川）文化很早就与华北、中原有文化接触”<sup>[2]</sup>。古代蜀的历史已露出一丝曙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有了很多重大发现，更为可贵的是这些发现已揭示出蜀文化发展演变的序列，并且蜀文化的渊源也已日渐清晰。这些考古发现为研究古代蜀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使得古蜀历史的研究跳出了传说的体系，展现出了全新的局面。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使得人们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审视古蜀文明。1963年广汉月亮湾遗址的发掘使得三星堆遗址初步揭开了面纱，当时尚未认识到月亮湾遗址是三星堆遗址的一部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正式的、科学地发掘。这里虽无惊人的发现，但却也有重要意义：第一，从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将遗址分为两期；第二，发现相当数量的残石璧和石璧的半成品、制造石璧留下的石芯；第三，发现了残铜片、炼渣、坩锅残片以及孔雀石。这些是对1934年发掘的突破也说明月亮湾遗址不是一般的遗址，后来发掘三星堆遗址的材料证明月亮湾遗址乃是三星堆遗址的一部分，并位于三星堆古

城的中部。经研究月亮湾一期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一期,月亮湾二期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三、四期<sup>[3]</sup>。

1980年的发掘拉开了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序幕,经过近30年的陆续发掘,收获颇为丰硕。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将遗址分为四期,在这里发现了房屋建筑遗址,高大宽厚的城墙遗迹、城墙外的护城壕沟,尤其是1986年发掘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了大批玉器、青铜器、金器以及象牙等,让世人震惊。认识到这里应是古蜀王国的都邑,已经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并且构成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已有学者将遗址第二、第三期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sup>[4]</sup>,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

1985年~1987年对成都市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在这里发现大型木构建筑,小型干栏式建筑。从出土器物看其陶器有三星堆文化的因素,同时出土了一批新的器物,即尖底陶器及圜底陶器。将以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十二桥文化,其年代晚于三星堆文化。

1953年发现、1956年发掘的成都市羊子山土台遗址,是一座高大的人工修筑的三层台级的土台,这是我国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少见的大型夯土台建筑。普遍认为是属于我国古代用于盟会和祭祀的礼仪性建筑。

2001年发现并发掘的成都市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又一处重要遗址,也是蜀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部,已查明遗址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现在仍在继续发掘之中,经过历年的勘探和发掘,遗址可分为:大型建筑遗址区、宗教祭祀活动区、一般居住区和墓地,出土了大批玉器、青铜器、金器、石器、陶器和象牙<sup>[5]</sup>。根据对出土器物的研究,金沙遗址晚于三星堆遗址,属于十二桥文化,出土的金器制作精美,其太阳神鸟图案被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青铜器缺乏大型重器,玉器中的璋出现大量小型者,显现出另一种风格,石雕人像、虎制作精细。与三星堆文化相比有同有异,有继承也有发展,是三星堆文化的后继者。

十二桥文化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包括新繁水观音遗址、成都新一村遗址、成都岷江小区遗址、彭州市竹瓦街青铜器窖藏、三星堆遗址四期、成都金沙遗址、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以及远

到雅安的沙溪遗址。

属于战国时期下限到西汉早期的考古发现,以墓葬材料为主,遗址较少。主要有成都市商业街的船棺独木棺合葬墓、新都木椁墓、成都羊子山172号墓、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绵竹清道船棺墓等大中型墓葬以及数量众多的小型墓,出土器物中以具有蜀文化特色的器物为主,青铜器除了大中型墓随葬部分中原文化系统和楚文化的礼器外,主要为蜀文化的生活用器。以容器、兵器、工具为主要组合,另有服饰器。陶器也多为蜀文化特色的生活用器并有自己的组合。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出土一大批漆器,颇有地方特点而不同于秦国、楚国的漆器,属于蜀国制造的漆器。

以上的考古发现,上起三星堆文化、中经十二桥文化到战国时期及西汉早期,构建了蜀文化发展的三个大的阶段。这许多遗迹遗物都是古代蜀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史料,使得古代蜀历史的研究,不再是仅凭一些传说材料,不再是笼罩在神话体系之中,而是有一大批实实在在的实物史料。其时代从商代开始,中经西周春秋,一直到战国延及西汉早期,虽然其中有些地方还显得较为薄弱,但整个框架是成立的。这个框架的构建是考古学界几辈人辛勤劳动的结果,是蜀文化研究的重大成果。从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器看,是以夹砂褐陶、夹砂灰陶为主要陶系,器形演变有序,是一个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

### 三

蜀文化有着较为发达的经济,由于考古发现的不平衡,有些部门发现较多的实物,有些相对较少些,但各个部门、各个方面需要协调、配合才能促使整体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有关农业生产的资料发现不多。从出土的石器看,成都平原上发现的石斧、石锛之类一般形体较小,制作精细,似乎并不适合用作农业生产和与农业生产有关(如砍伐)的工具。冯汉骥先生早就指出:“不过在考古中很少发现当时的农具,想其主要为木制所致”<sup>[6]</sup>。童恩正先生也指出:“茂密的森林向人们提供了大量加工方便、易于携带、取材容易、使用效率高的制造工具的原料——坚木硬竹”<sup>[7]</sup>。成都平原为

冲积平原,自然条件优越,使用这类坚竹硬木制作的农业生产工具是很方便的。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木耜为直接证据<sup>[8]</sup>,在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殷商时期的灰坑壁上都有木耒齿痕的发现<sup>[9]</sup>,可以作为旁证。在成都平原蜀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有一种打制的盘状器,数量众多,如成都十二桥遗址就出土51件<sup>[10]</sup>。对于成都方池街出土的石器微痕研究和模拟试验,认为这种石质的盘状砍砸器的用途为以加工竹木料为主<sup>[11]</sup>,是这种木制农业生产工具存在的间接证据。至于雅安沙溪遗址出土众多的打制石器中,有肩石锄、有肩石斧应为农具或和农业生产有关的工具应无疑问,这和沙溪遗址所处的自然条件有关。李明斌先生指出:“那么有肩石器在沙溪遗址和青衣江流域的大量发现,说明当时的农耕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同时,这也和遗址地处盆地边缘的丘陵、河谷地带,掘土不易,适宜发展山地经济是一致的”<sup>[12]</sup>。对成都一些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相当商周时期的气候、植被等都是适合农业生产的<sup>[13]</sup>。从以上各方面看当时应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活动。另一些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骸证明存在家畜饲养<sup>[14]</sup>。

手工业生产。从三星堆遗址1号、2号祭祀坑,金沙遗址“梅苑”发掘点出土了大批玉器、青铜器、金器等。这些器物中的金器、青铜器中以神树、人像、面具为代表的一组,玉器中的一部分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证明为本地制作,反映了古蜀文化有相当发达的手工业。据调查三星堆、金沙遗址金器的原料可能就在四川盆地西北和盆地周缘地区,这些地方“有品位很好的金矿分布”<sup>[15]</sup>。对三星堆遗址1号、2号祭祀坑出土的部分玉石器鉴定的结果,“可以设想石料的来源可能是在成都附近龙门山脉南段,即茂县——汶川——灌县一带”<sup>[16]</sup>。对金沙遗址出土玉器鉴定的结果,“成都平原西北部山区应是透闪石器(也包括板岩器)的溯源地。该区汶川县龙溪(曾产出透闪石玉)当列其首选”<sup>[17]</sup>。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成都理工大学“在四川汶川龙溪马灯乡采集到现代玉矿标本。肉眼观察,其色泽肌理、质感与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部分玉器非常接近(特别是部分青玉与白玉材料最为相似)。”“可以初步确定金沙遗址部分玉料可能与汶川龙溪

乡一带的玉矿有关,部分玉料可能出于该地<sup>[18]</sup>”。从各方面情况看,这些器物都是在成都平原地制作,原料也主要来自成都平原周边地区。对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部分青铜器的鉴定:“从金相组织观察中看出:这些铜合金的浇铸件大多数都存在着气孔和铸造缺陷。这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铸件比较,反映出巴蜀地区在青铜器冶炼和浇铸技术上的落后和不成熟”。关于锌“在这批铜器的成分分析中,我们特别注意了这一问题,结论是:微量锌是不存在的。在全部样品的分析结果中,未发现锌的踪影。这表明:在殷商后期,蜀人用来冶炼青铜的铅矿,可能不是通常使用的铅锌矿,而是无锌伴生的铅矿,这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冶炼青铜的原料之一——铅的产地是不相同的”<sup>[19]</sup>。冯汉骥先生对彭州市(原彭县)出土青铜器研究认为:“这五件列罍,形状和花纹虽大体上同于晚殷和早周的同类器皿,但骤视之则颇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所以可以视为蜀土本地所铸。其样式和花纹虽取诸于当时的中原铜器,但组合意趣不同,故而显出地方色彩”<sup>[20]</sup>。可见从青铜的冶炼到青铜器的铸造都有自身的特色,蜀人已具有较为成熟的青铜铸造手工业。此外陶器的生产也很发达,技术相当成熟,且有自身特点的器物和纹饰。成都市商业街船棺墓出土的大批漆器从器物形制到纹饰都很有特点,如果说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出土漆器具有楚文化漆器的特点,青川、荥经秦人墓出土漆器为秦文化漆器的特点,则商业街漆器风格不属楚文化,也不属秦文化,乃是蜀文化的漆器<sup>[21]</sup>。以上这些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各类器物,都为在蜀地生产,古蜀文化已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部门,在经济领域内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手工业内部亦有明确的分工,具有一批技术精湛的工匠。虽然其间某些方面曾受到中原地区(包括秦)、楚地的影响,但毕竟是蜀地生产发展的结果。

交换活动。这方面的材料发现不多,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海贝,经鉴定有环纹贝、虎斑纹贝、货贝<sup>[22]</sup>,这些海贝应为交换所得,交换的方式目前尚不清楚,但产品的交换活动应是存在的。战国时期出土的钱币总的看,在秦举巴蜀以后。根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



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阡、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看来在举巴蜀以后，在蜀地着力推广秦的制度，这时蜀地出土的“半两”钱，可能逐步作为货币使用。

#### 四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器、金器、青铜器和象牙。这些器物中大体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如玉器中的一种像璋又像戈的器物、射部呈“V”形的牙璋，青铜器中的神树、人像、面具等以及金器；另一部分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器物，如玉器中的戈、射呈凹弧形的牙璋和璧、环类器物，青铜器中的尊、甗（原称鬯）、盘等。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金器、青铜器有同样情况。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器物主要为祭祀用器，表明古代蜀人有自己的信仰。从出土的青铜人像看，不同的头饰代表着不同的民族（部族）来参加蜀人的祭祀活动，说明当时在各氏族之上有一个以蜀族为主体的政治实体一方国。从出土的青铜面具看，许多学者认为是巫术的用器，各类奇形怪状的面具，不必从神异方面猜测，既为古蜀人祭祀、原始宗教的面具，做成各种超出人们想像的形状，是必然的，这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并不奇怪，这种情况在中原商周文化青铜器上也存在，如各种兽面纹，只不过它们的功能不同，正如郑光先生所说：“但中原青铜文化仍以政治性意义（标志等级地位和权力，符合国家典制的祭祀和丧葬所用）为主，神秘主义仅居其次，巫术意更淡”。“三星堆的青铜人像、头像、人面、面具、神树等属后者，其巫术味极浓（如高2.6米的带华冠的立人像，完全是一个巫师的形象），二者性质与意义是不能等同的”<sup>[23]</sup>。三星堆两祭祀坑出土青铜人像这一组青铜器，还有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及其它有地方特点的器物所折射出的是古蜀人的宗教信仰、社会意识。蒙文通先生指出，“古时中原人说人死后魂魄归泰山，这都是原始宗教巫师的说法，显然各为系统。从这一点来看，巴蜀仙教之说不妨是独立的，别自为系”<sup>[24]</sup>。我们今日看待这些具有蜀文化特色的这一群器物，自然不能以“怪异”、“奇诡”对之，而应以历史的、多元文化的角度来对待，它们反映的是古代蜀人的信

仰、宗教、社会意识等诸方面的信息。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这部分器物，从器物种类看，蜀人在吸收、接受它们的时候是有选择的，选择什么、扬弃什么也代表了他们的思想，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窖藏的列壘制度，也反映了蜀文化的特色，可能是蜀人“礼制”的某些体现。只是古代蜀人的这些社会意识，我们今日不甚了解，不妨留待后世在积累更多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探索、研究逐步解决。

战国时期蜀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基本组合以生活用器（容器）、兵器、工具为常见，体现了古代蜀人历史的发展和观念的改变。大约是从神权到君权的演变。

蜀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及彭县竹瓦街窖藏出土的青铜器尊、甗、壘等，玉器中的戈、璋和璧环类等是这种影响的物证。在商周时期蜀文化有选择地接受了中原文化系统的一些礼器，证明至迟在商代蜀地和中原地区已有较多的联系，竹瓦街殷代二觶的出土证明“《牧誓》之具有信史价值应是无可置疑的”<sup>[25]</sup>。当时的交往通道除了长江、汉水之外，还应有翻越秦岭经陕西南部地区到成都平原，陕南城洋地区的宝山文化是其中介之一<sup>[26]</sup>。战国时期蜀文化接受了中原文化（包括秦文化）、楚文化的一些青铜器、陶器、漆器等。这一时期蜀地和上述地区接触、交往颇多，文献资料有明确的论述，这和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 五

蜀文化是成都平原上土生土长的，从三星堆文化时期到十二桥文化时期再到战国时期是一脉相承，有发展、有变化，这些在考古资料中很明显的，和《蜀王本纪》所说不同。20世纪90年代宝墩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证明蜀文化源自宝墩文化，特别是宝墩文化鱼鳧村三期文化的发现对研究蜀文化渊源更为重要，有学者已提出鱼鳧村文化这一命名<sup>[27]</sup>。蜀文化源于宝墩文化得到了考古材料的支持。

#### 六

以上扼要叙述了1949年来，在蜀文化考古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些考古发现研究

成果使古代蜀的历史不再茫然,不再处于神话、传说的包裹之中。虽然尚无文字和文字记载的发现,但这大量的古代蜀人创造的物质文化摆在人们面前,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第一手史料。它们不但反映出古代蜀人的生产、生活,也折射出蜀人的政治组织、意识形态和原始宗教信仰。这些就是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古代蜀的历史画卷,这些使我们看到了早在商代或更早,光辉灿烂的古蜀文明,应是整个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见证。

从宝墩文化经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到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继承、发展的脉络基本清晰,阶段性也十分明显。一些器物消失了,一些新的器物出现了,这些正是古蜀历史发展的明证,也说明蜀文化发生、成长于成都平原上,并且很早就和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原的商、周文化有交往、有联系。从另一方面说,传说中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等人物或时代,不管实际上有无其具体的人或其时代,以上的考古发现证明这些传说时期在成都平原上确实有先民们生活,并以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历史。这对研究传说材料倒是有所帮助,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现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若从整理传说史料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sup>[28]</sup>。这一论断在尚无文字和文字记载发现的蜀文化中,同样适用。

注释:

[1][25] 徐中舒:《四川彭县濛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觶》,《文物》1962年第6期。

[2] 葛维汉:《汉州(广汉)发掘简报》,沈允宁译、陈宗祥校,转引自《三星堆研究》第一集95页,天地出版社2006年。

[3] 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4]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5]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6] 冯汉骥:《西南古奴隶王国》,《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7] 童恩正:《略论我国西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四川

文物》1985年第2期。

[8] 存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厅。

[9]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70页、81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2.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考古》39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10] 四川省文管会等:《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展简报》,《文物》1987年第2期。

[11] 傅正初:《成都市方池街蜀文化遗址出土石器的微痕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12] 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30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3] 1.罗二虎等:《成都指挥街遗址孢粉分析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2.四川大学博物馆等:《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3.王毅:《成都市巴蜀文化遗址的新发现》,《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

[14] 1.王毅:《成都市巴蜀文化遗址的新发现》,《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2.何锐宇:《十二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四川文物》2007年第4期。

[15] 成都文物考古所:《金沙——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第1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16] 刘兴源、陈德安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玉石器岩石类型薄片鉴定报告》,《三星堆祭祀坑》附录,文物出版社1999年。

[17] 杨永富等:《金沙村遗址玉、石器材料鉴定及初步研究》,《金沙淘珍》193页附录,文物出版社2002年。

[1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玉器》18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19] 曾中懋:《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成分的分析》,《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

[20] 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铜器》,《文物》1980年第12期。

[21] 1.江章华、颜劲松:《成都商业街船棺出土漆器及相关问题探讨》,《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2.宋治民:《成都市商业街墓葬的问题》,《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

[2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第150页、41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23] 郑光:《从三星堆文化看古蜀地与中原的关系》

[24]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10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26] 1.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文物出版社2002年;2.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城洋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

[27] 李明斌:《再论温江鱼凫村三期文化性质》,《华夏考古》待刊。

[28]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112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